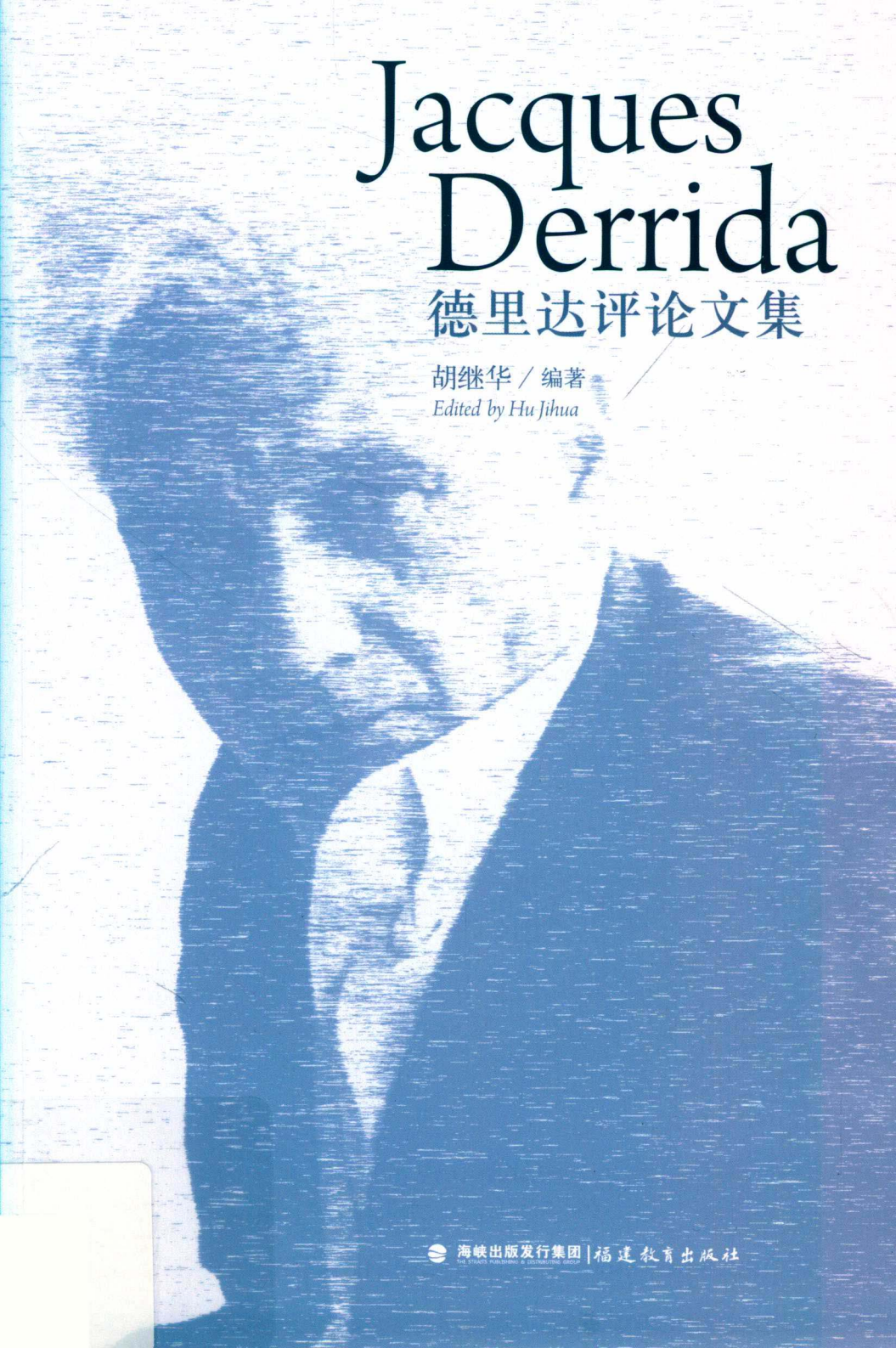




Jacques Derrida

德里达评论文集

胡继华 / 编著

Edited by Hu Jihua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Jacques
Derrida
德里达评论文集

胡继华 / 编著

Edited by Hu Jihua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里达评论文集 / 胡继华编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9. 3

ISBN 978-7-5334-7208-5

I. ①德… II. ①胡… III. ①德里达, J. (1930 - 2004) - 思想评论 - 文集 IV. ①B565.5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10762 号

德里达评论文集

胡继华 编著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25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62027445

发行部电话: 010-62024258 0591-87115073)

出版人 江金辉

印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福州市福兴投资区后屿路 6 号 邮编: 350014)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1.75

字数 325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7208-5

定价 45.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目 录

导论：走向不可能的诗学 / 1

德里达的地形学：解构批评的可能性 / 11

Derrida's Topographies / 15

盲人回忆录：绘画起源于不可见 / 45

Memories of Blind / 50

如何命名？——致意与拯救的诗学 / 83

How to Name / 89

被给予的时间：君王的时间 / 126

Given Time: The Time of the King / 130

福楼拜的一个理念：柏拉图的书信 / 167

An Idea of Flaubert: Plato's Letter / 172

何为一种“适切的”翻译？ / 197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 202

示播列：诗歌就是创伤 / 239

Shibboleth / 244

拯救名相：“后记”到永远 / 308

Sauf le nom / 314

鸣谢 / 368

导论：走向不可能的诗学

本书缘起盖肇始于研究生专业课程——“批评理论与实践”的设置与实施。在“批评理论和实践”这个题目下设置一个“德里达与文学批评”，意在将理论批评化，在细致的文本阅读中“诱惑”学子领悟当代批评的神韵。

然而，这却不是一条平坦的康庄大道，也不是没有焦虑，更不会没有风险。

20 世纪法国思想家德里达，以及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解构”，在全球化时代的学术江湖掀波涌澜，呼风唤雨，蔚为大观，看似热闹非凡。然而，哲人仙逝之前，却语若暮鼓晨钟：“世人还没有人开始读敌人的文字……”并非语出惊人，夸大其词，自知乃是哲人自律的标志。他当然掂量过自己的斤两，且泰然面对自己的处境。在经典学院派的课程目录上，德里达和福柯甚至还包括海德格尔都被打入禁区，精读细绎者鲜，而好奇猎艳者众。20 世纪 80 年代古典学的复兴以及伪装成人文主义的布尔乔亚意识形态，三番五次地通过“博雅课程”“核心课程”和“自由教育”来重建传统的“同心圆”（centered circle）和“全景监控”（panopticon）。“同心圆”和“全景监控”都是一些隐喻，在它们内部都镌刻着一种清除差异、巩固同一的权力意志。权力意志经纬天地，权力之眼笼罩古今，哪里还容得下德里达的“踪迹”与“延异”！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布拉格“毒品”冤案，20 世纪 90 年代初剑桥大学“名誉博士”风波，乃至巴黎高师长达 14 年的“助教”生涯，及少年时代在自己的出生地——法属阿尔及利亚——感受到的“眩晕”……透过哲人生命中的斑斑“踪迹”（trace），就连我们这些博地凡夫也不难发现，“解构”是怎样炼成的。解构，就是驱散那种

人人都感到惬意的熟悉感，还原一个人都感到惊异的陌生状态。将在此的一切都感受为异乡，从而激起惊异，这不仅是解构的苦心孤诣，更是自古希腊悲剧时代以来的一切称得上哲学的学说之苦心孤诣。

要接近地理解解构的苦心孤诣，回顾一下德里达的志业生涯是有所增益的。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解构初出学术江湖，精致不够而毛糙有余，难以命名却锋芒毕露。秉承笛卡尔的怀疑论，将康德的批判方法运用到整个西方思想传统，改造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fundamental ontology），德里达断言整个西方思想史受制于在场形而上学（the metaphysics of presence），而在场形而上学奠基于脆弱空灵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或“语音中心主义”（logocentrism or phonocentrism）之上。言语高于文字，于是一套“白色神话体系”（white mythology）灿然成型，自柏拉图到卢梭，再到胡塞尔和列维-施特劳斯，“太阳喻说”（heliotrope）千古不易。这是德里达的文字学阶段。

20 世纪 70 年代，德里达沉湎于文本实验，一本似书非书的《丧钟》（*Glas*）令读者瞠目咋舌，将视觉、听觉、触觉元素一揽子融于只可观赏而不可倾听的文本织体之中，将哲人的虚灵帝国（黑格尔）和诗人的情色江湖（热奈）熔于一炉，恍若用尼采的“锤子”敲响了西方形而上学体系的丧钟。诗人的情色颠覆了哲人的虚灵，白色的神话体系被攫入黑夜，一部无以名状的黑色神话传递出启示录的信息。文类的法则，书籍存在的合法性，文字之于言语的边缘地位，言以传心、文以载道的古典律令，在德里达的百科全书式书写之中无声地遭到了质疑，惬意的一切都被感受为惊异的一切。一个无所牵挂的游牧哲人，一个浪迹在大地上的异邦人，这就是德里达的文本实验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政治文化格局惊天剧变，国际政治事件一波三折，德里达与时俱进，心系天下，从而开启了哲学的“另一航程”（the other heading），那就是对宗教、伦理、政治、正义、种族身份、差异的正当性展开哲学思考。“友爱的政治”“为他人的伦理”“未来的民主”“没有弥赛亚的弥赛亚主义”等命题围绕着“正义”聚结起来。“正义”被拓至无限的地平线之外，被称之为“解构的条

件”。一切均可解构，唯解构的条件不可解构。正义是解构的条件，所以“正义不可解构，正义就是解构”。于是，德里达的思想在一定幅度上颠覆了正在衰落的“后现代思想”及其与之形影相随的犬儒主义，而试图把当代思想文化再度导入“伦理转向”“宗教回归”的轨道。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千年之交的世界如同万花筒，世事变化有如魔幻小说，国际政治格局演变有如滑稽剧。世界越来越“德里达”——本来无一物，解构何处行？本来无一物，非幽灵者何？用佛家语言说，既然共业难为，何不舍离色相，虚己而就真如？如果说，早期的解构方略，只不过是运“方便巧”，那么，晚期的“幽灵学”，便是演“如实慧”。如“实”者何？乃逆黑暗而进直面灵知也，乃目击紊乱迷惑而寻觅救赎之路也。“幽灵学”，始于一个显白的事实——幽灵出场，幽灵退场，幽灵再出场。徘徊在当下世界的，不仅有祖先的思想幽灵，而且有媒介文化的影像幽灵。幽灵发声，成型成像，婉转流传，逸韵升腾，幻象的瘟疫蔓延，他们要求哀悼，要求承诺，要求回应。德里达幽灵学的思想深度恰在于，穿越犹太—基督—希腊—近代理性主义的层层感伤迷雾，而返回到三大一神教的起源——“亚伯拉罕精神”。亚伯拉罕精神源头久远，威权不蚀，意志强劲，不仅隐隐支配着整个世界的历史节奏，而且构成了当代世界国际纷争的母体（matrix）。言下之意，当下的血火纷争，神话暴力，神秘权力，恐怖活动，“流氓国家”，举凡一切纷争都源自亚伯拉罕所象征的“有条件的友爱”，而一切纷争都是“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2001 年 9 月，德里达终于夙愿以偿，来到了他自己著作中如梦般缀织的中国，从北京到上海，宣讲他的宽恕、幽灵、弥赛亚期待以及对死刑之前提的反思。在北京的一场以幽灵为主题的讲演中，一位青年学生发问：“我们知道，有圣灵，有邪灵，也有幽灵，但人们对幽灵和邪灵如此感兴趣，为什么就没有人对圣灵感兴趣？经上告诉我们，圣灵降临时分，我们无比幸福！”德里达回答：我的圣灵，就是那个没有实体但绝对值得期待的“他者”，那个我们总是必须为之、对之、面之而做出回应的“他者”，那个我们必须担负起绝对责任的“他者”，也就是那种“没有弥赛亚的弥赛亚精神”。他在东方的国土

上期待弥赛亚，但大洋彼岸的“9·11”恐怖袭击的惊天消息反讽地传来，满头银发的老者守着电视机，在他乡客栈拥衾不寐，度过了不眠之夜。自此以往，恐怖时代的哲学，就构成了他思想的重力。这是德里达最后几年的“幽灵学”，思之所及，都是主权、宗教、精神、传统，以及人之为人的绝对责任感和永恒的悲剧意识。哀悼幽灵而展望未来，此乃一个哲人不可转让、不可摇夺的良知。

文字学、文本实验、伦理转向以及幽灵学，对德里达思想旅程的粗略区分，这种区分不可以绝对化。“解构”贯穿其中，成为一个时代的亮色，表现哲人的现代诉求。

然而，何谓“解构”？汉语里，“解构”不是一个新词，在汉代就已经非常流行了。其含义有二：一是指附会造作，《淮南子·俶真训》：“孰肯解构人间之事，以物烦其性命乎？”高诱注：“解构，犹合会也”；二是指离间，《后汉书·窦融传》：“（隗）嚣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祸将及，欲设间离之说，乱惑真心，转相解构，以成其奸。”

那么，从德里达那里舶入中国的“解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作为一种思想史观，“解构”就是“无法恢复原始在场的绝对明证性使我们必须涉及绝对的过去”（《论文字学》第一章）。“解构”就是追问被历史、传统遮蔽的东西。这种思想史观直接源自海德格尔：“随着追问不断向前驱迫，直到有一道更其源始更其浩瀚的境域展开出来，那便是或能求得存在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的境域。”（《存在与时间》，第6节）德里达自己发挥说：“解构哲学，恐怕就是以那种最忠实、最内在的方式去思考哲学概念所具有一定结构的那种谱系，同时也是从某种它无法确定、无法命名的外部着手，以求确定那被其历史所遮蔽或禁止的东西，而这种历史是通过一些对利害关系的压抑而成就的。”（《书写与差异》，“访谈代序”）

其次，作为一种文本策略，解构宣称“本文之外别无一物”。这个命题一旦变成公式、变成口号就相当危险、相当荒谬，仿佛他就是在明火执仗地传扬虚无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可是不然，德里达的初衷是提醒读者，面对文本，不要轻易相信蕴含于其中的意义之权威性，不要将意义之权威性归给作者的思想、意图、情感。说到底，意义不是现存的，而是发明的和生产的，而且趋向于无限，总是被延宕

在能指的无尽游戏之中。

第三，“解构”作为一种阐释方式，乃是超越存在、上帝、本质、人文主义、人类学种族主义，尝试思考那种不可还原的差异，及其共同渊源——“延异”。通俗地、形象地说，作为阐释方法，解构就是隐约地显现意义历史形态的受精、孕育、成型和分娩的全部生命化过程而已。

第四，“解构”作为一种书写风格，乃是同时写作多种文本，在多层次上结构文本，在文本之上叠加文本，在踪迹之上再留踪迹。偶然之际，德里达从自己卷帙浩繁的文字之中拈出“灰烬”，赋予了“灰烬”以历史的荣耀和灵性的尊严。因为，“灰烬”令人联想到“二战”期间纳粹系统灭绝犹太种族的“最后解决”。灭绝、驱赶、焚尸和献祭，“灰烬”便与这些惨痛的记忆和无辜的苦难紧密相连。以“灰烬”喻指“文本”，解构就是一种典型的启示录式书写风格，它是一种要为人类的万种苦难立言的终极诉求。在“灰烬”上书写，就是将灵性贯注于生命的残存踪迹，从而让这些踪迹为那些绝对销毁的证据提供坚实的证据，为那些完全消逝的爱留下忧伤的剪影。总之，作为写作风格的解构，那是一种守护着思想尊严的疯狂，而不是一种临水鉴影的无聊自恋。“都将文字销余日，难把幽忧损壮心。演易已成殷牖贲，援琴犹学楚囚音。”德里达的诗思及其表达，堪为顾亭林的胸次做一生动注释。

第五，解构作为一种语言文化景观，乃是“一种以上的语言”（more than one language）。哪里有“一种以上的语言”的体验，哪里就有解构。世界上每天都有物种在灭绝，都有泰古冰川在消融，都有原始森林在萎缩，同样都有部落及其语言在消逝。然而，世界上毕竟存在着“一种以上的语言”，一种语言内部也存在着“一种以上的语言”。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齐物论》）此等“天籁”境界，即语言的多样性，恰恰是“解构”所特别关注、尤为关切的“大道”。

故此，解构是一种思想史观，一种文本策略，一种阐释方法，一种书写风格，一种语言文化景观。说到底，解构更是一种谋生之道，一种生存样法，一种建构意义而非埋葬意义的情感动力。然而，德里

达却反复声明，解构不是一种理论，也不是一种方法。德里达言之钩钩，却并不妨碍解构批评的文学实践。

1979年，也就是解构飘洋美国十年之后，德里达与耶鲁大学四位批评巨子携手合作，联袂推出《解构与批评》论文集。一卷书册，结集五篇论文，布鲁姆的《形式破裂》，德·曼的《残面雪莱》，德里达的《边界持久生存》，哈特曼的《华兹华斯：词语、希望与价值》，米勒的《寄生批评家》，大有广而告之，为解构批评开山立派的阵势。在该书序言之中，哈特曼轩然名笔，提撕困扰同时代批评的两大难题，而解决这些难题构成了解构批评家的共同意旨。第一个难题、第一重意旨涉及批评实践在文教系统之中寄人篱下的卑微地位，解构批评家当仁不让地以勇者自命，力求为批评挣得一席之地，让批评更为成熟、完成更高的文化使命。在他们看来，批评乃是文化世界的构成部分，有其独特而复杂的力量，有权履行哲学、文学、反思和修辞的职能。第二个难题、第二重意旨乃是探索文学的力量。他们追问：文学力量在于何处？以何等方式呈现？能不能提出一种既有足够描述能力又有足够解释效力的理论来“照亮”而非“困扰”艺术作品？他们坚信，在文学共和国，语言高于意义而享有优先权，语言就是意义的道成肉身。所以，他们拒绝将文学的力量等同于体现意义的思想。他们解读古今经典，总是在哲学的视野下进行，在柏拉图那里“古已有之”的诗哲之争仍然在延续，因而他们的批评实践充满了张力。

语言优先，修辞至上，解构批评的这种取向让这些批评家获得了“新智者”“新犬儒”的贬称。然而，正是他们运用语言建构了美学意识形态的大厦和一个纯净的语言乌托邦。策应哲学的语言论转向，解构批评家将文学明确地定义为语言的艺术。米勒写道，批评家的入口，“乃是语言，而语言乃是他已然栖居其中的媒介”。批评家之所以自己嵌入文本之中，是因为他们自己和文本都已经为一种共同的语言所渗透。不仅批评的媒介是语言，阐释的方法也是语言。在他理解文本的时候，批评家总是踵事增华，即便是在最为被动的阅读之中，他也会将自己的语言注入文本之中。将自己的语言注入文本之中，造就的是文本的织物，词语的迷宫。“迷宫”与“织物”，是解构批评

家偏爱的隐喻。批评行为，或者广义的文学行为，就是编织、折线、再编织以及寻觅纹路的行为。面对一幅文本织物，批评家总是有事可做：在帕涅罗普的文本之网上添加自己的织物；拆解织物以便露出其结构的线索；重新编织这些织物；在文本之中寻觅一条纹路，展示其设计的肌理。迷宫，曲径交叉的花园，金字塔地下深渊，无底的棋盘，未结的棋局，这些隐喻都喻指解构的文学行为和批评的语言游戏。

早在1975年，后来成为“东方学”大祭司之一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萨义德就创作了《开端》一书，被当时贤称之为“非常批评之作”。其实，包括德里达本人在内的文本绎读在内的解构批评，也配得上“非常批评”这顶桂冠。这种批评并非建立在传统、思维习性、历史和一般语文学的信念之上，相反倒是要质疑传统，反思思维习性，对历史进行创造性转换，实现一般语文学的创造化生，让古典不古，让遗物灵韵流溢。米勒曾说，解构批评乃是“一种从迷宫一般曲折的语词逻辑之中逃逸出去的尝试”，它常常通往反逻辑的荒诞深渊，与智力对抗，几乎取得了成功。逻辑在解构实践中失败的时刻，恰恰就是解构批评家进入文学语言（进入语言本身）的实质时刻。如果说语言是一座迷宫，文学语言则是更精巧更复杂的迷宫，那么解构批评就是以精巧复杂的步幅流浪在这座迷宫。

毕生以捍卫“正典”为使命却著书立说传扬“修正主义批评”的布鲁姆，则将解构批评追溯到西方思想史上的“灵知主义”（Gnosticism）隐秘传统。“灵知是解构的开始，也是最有力的解构。”他补充说，灵知主义是一种误解的理论，作为一种创造性的误解，它对任何有影响的当代理论都是一个必要的模型。在修正主义批评的经典之作《影响的焦虑》中，布鲁姆断言，每一个强劲的诗人都有一种破坏性的创举。面对强劲的先辈，迟到的强劲诗人唯有破坏传统才能安身立命，正如黑塞《彷徨少年时》中灵鸟破壳而振飞的隐喻所喻指的那样，要砸碎一个旧世界，新生命才能诞生。在西方思想史上，灵知派代表着一种与正统相反的圣经解释学，解构批评以文学为视角延续着并光大了灵知主义的反抗、革命以及救赎的诉求。1982年，布鲁姆在《对峙：走向修正主义理论》中称赞灵知主义，说这一传统

是“首次强有力的解构，因为它破坏了所有的世系，搅乱了所有的等级，使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一切关系都寓言化了，把所有神性的象征都当做无所指称的虚空而加以严词峻拒”。布鲁姆所言，有其言过其实之处，然而将解构的元祖追溯到西方历史上的异端，确实授人以柄，所以人们不无理由地把解构与虚无主义相提并论。

解构不是虚无，解构批评也不是虚无主义。“解构批评”一语，不仅歧义丛生，而且还同语反复。因为，说到底，在质疑、反思、转换和创生的意义上，批评就是解构。为方便起见使用“解构批评”，可以做三种理解：援引解构，用于文学批评；解构与批评互相激荡，解构体现于批评实践，批评凸显解构之维；将一切阅读行为和批评活动都视为解构。无论在何等意义上理解，解构批评都彰显了四个特色。首先，解构批评通识博雅，拆解了人为的学科区隔，质疑了文类区别，将一切文献当做文学来展开修辞学和语言学阅读，让一切文本具有孕育和生殖能力。其次，解构批评承纳传统，而非颠覆传统，肯定而非否定，乃是解构的初衷；尤其是肯定那种无法还原的绝对差异，是解构批评的担当所在。再次，解构批评汇通哲学与文学，强化了诗思张力，一方面让诗歌意旨杳深，一方面又让思想诗兴流溢。最后，解构批评关切人文，质疑过人类中心主义，却未废黜人文传统，相反却要建构面向未来的人文学。新人文学的基本领域包括：人的历史与“特性”；民主和主权观念的历史及其无条件性；传道授业、志业、职业以及劳动的历史及其世界化；文学与自由言说的历史及其无条件性；伦理、正义以及信仰；虚拟陈述以及影像的历史与特性；权威终结之后权威事件的降临，救恩历史的无条件性。博雅、包容、肯定以及面向未来的新人文，可能就是解构批评为文学涉世以及淑世易俗描绘的可能前景。

作为解构批评读本，本书选编了8篇论文。米勒的《德里达的地形学：解构批评的可能性》，勾勒了解构批评的巨大领域。为了全方位勾画解构批评的地图，就必须有一种虚拟的永无止境的绘图程序，从文学的隐秘开始，通过解析修辞、意象与人物，而渐渐逼近不可能性和绝对的责任。因为德里达有言在先，如果真有解构这回事，那就不用说，它不止一次发生，作为不可能的体验而发生。而这种不可能

性，悖论地呈现了对于他者的绝对责任。

从《盲人的回忆录：绘画起源于不可见》中摘出的片段，是德里达思考造型艺术起源的经典篇章。通过盲人的回忆来探索视觉艺术，德里达机智地解构了视觉中心主义对于西方艺术史的霸权，将摹仿论和透视法解释为西方思想史的原罪。从技术入手，德里达严格区分了涂画与绘画，而将笔触/笔法置于艺术思考和审美沉思的中心，强调笔墨行为的反透视倾向、笔触的退缩隐逝或者有差异地消失以及笔触的修辞学，从而凸显了视觉艺术向触觉艺术的还原，得出了“圣像学传统的终结”的结论。

《如何命名？——致意与拯救的诗学》是德里达为法国现代诗人德吉（Michel Deguy）的诗集《侧身而眠》（*Recumbents*）撰写的专论。为这位同龄人写专论，德里达延续了他对马拉美诗学的解构批评，致力于在诗人的作品之中捕捉那些吉光片羽，那些不可还原的绝对差异，那些句法词法之中无法消除的语义剩余物。命名，是这篇文章的主题词，而命名又同遭遇、问候、祝福、祈祷紧密相关。德吉本人自撰论文，承认德里达的解读独到而且重要。德里达对于解构批评之重要性，恰如德吉对于当代欧洲诗学历史之重要性。诗人与哲人，毕竟是文人，他们努力的目标，不是拆解西方传统的大厦，而是从根基“理解这一建筑物”，为带着一种彻底更新的意识栖居其间敞开新的可能。

《被给予的时间，君王的时间：礼物的悖论》让解构的睿思运行在悖论之间，在逻辑绝境中建构一种关于“礼物的经济学”。德里达提出，礼物即无条件的馈赠，必须在赠与者和接受者都无条件地遗忘它作为礼物的存在时，礼物才是礼物。将礼物从循环的有限经济之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对他者的慷慨施予，而不求回报，这便是“为他人的人道主义”伦理学的绝对律令。

《福楼拜的一个理念：柏拉图的书信》从文学史中的一则轶事开启解构之旅，利用一个卑微的文学形象，把近代文学与哲学之争画成了一幅漫画。福楼拜笔下那位“堂兄哲学家”简直就是信史，是古代哲学经典的译者，他兼收并蓄地将理念论传统发送给福楼拜及其笔下男女。他不仅是柏拉图理念的信史，还是黑格尔观念的译者，因而

代表着思想史的宿命，预示着哲学的枯竭。

《何为一种“适切的”翻译?》探索了翻译问题。翻译据说是“当代比较文学唯一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它完全不可能却又绝对必要。德里达在“适切”(relevant)与“扬弃”(relève, Aufhebung)之间展开语义类比，以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的名句为个案，将翻译的技术转化为翻译的艺术，将翻译的艺术提升到哲学、神学—政治的维度。翻译是一种可被称为慈悲的体验，一种绝对不可能的体验，而慈悲就是扬弃，就是压抑和升华。在赎罪、偿还、和解和拯救的地平线上，翻译也是这种趋向神性的不可能的体验。

《示播列：诗歌就是创伤》是德里达“不可能诗学”和“伦理诗学”的核心篇章，探索了20世纪悲情诗人策兰诗中的“日期之谜”。日期关联着历史的灾难，人类的苦难，宇宙的灾异事件，心灵的深度创伤，以及身体的道道切口、累累伤痕。一个独一无二的日期，却可以无限重复，是一道过关口令，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签名。记下某个日期，就是在诗学镌刻的独一无二性之中镌刻个体独异的体验。“一个时刻中许多时间，一个独特诗学行为中许多语言。”所以，日期之谜又关联着文化政治和主权。

《拯救名相：“后记”到永远》是德里达一篇论述“否定神学”的专著的后记。通过解读德国神秘主义诗人斯勒西乌斯(Angelus Silesius)的诗作，德里达将解构同“否定神学”传统联系起来，同启示—终末论灵知主义联系起来，把对神性的命名称之为“对不可能性的激情”。在灵知主义和神秘主义脉络中，“否定神学”的基本特征之一，乃是逼近极限，越过一条前线，将一个共同体的边界，将一个社会政治制度或宗教机构之存在理由的边界含于其内。而这完全不可能，却又绝对必要。哪里有界限，哪里就有跨越；哪里有禁区，哪里就有僭越。所以，虽然没有公然命名，在犹太思想、穆斯林思想、佛教思想文化之中，那些比比皆是的翻译、类比、传输、转换、隐喻，都寓涵着“否定神学”对于“不可能性的激情”。毋庸置疑，解构批评已经进入了灵知主义神秘的深渊，而“不可能的诗学”生成于宗教维度之上。

德里达的地形学：解构批评的可能性

米勒 (J. Hillis Miller, 1928—) 是解构批评的践行者之一，仍然活跃在当今文学批评界。米勒早期服膺日内瓦意识批评学派，秉持现象学“朝向事情本身”的断制，热衷于再现式阅读 (mimetic reading)，迷恋于主题批评 (thematic criticism)。德里达解构论登陆美国，米勒与之一拍即合，随后同德里达交游甚密，于学理上彼此启发，在思想上互相激荡。世人将他同德曼、哈特曼、布鲁姆并称，赐绰号曰“耶鲁四人帮”，从此就注定了他将以“解构批评家”传扬学界，甚至还会载入文学批评史册。德曼、米勒、哈特曼、布鲁姆以及德里达合著的《解构与批评》(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堪称解构批评的宪章。在该书序言中，哈特曼称德里达、德曼、米勒为“蟒蛇的解构主义者” (boa-deconstructionist)，而称他自己和布鲁姆为“勉强的解构主义者” (barely deconstructionist)。哈特曼所言不虚：十足的解构主义者如蟒蛇 (boa)，凶猛而又慧黠，面对古今经典文本体系发起攻势，可谓势如破竹，不怕你深文周纳。像其他解构批评家一样，米勒善变，学无常道，理无至尊：从执着于意义的“现象学批评圆圈”逃逸而出，将修辞性置于逻辑性之上，以隐喻、转喻、寓言的修辞学体系为视角逼近文学性。而文学性究竟为何？解构论者若以古典汉语属文，一定会说“神无方而易无体”，大师与晚学一样感到无比尴尬。尴尬之余，米勒又力举“阅读的伦理”，在文学批评领域率先开启了当代人文学科的伦理转向。世人无不为之感到惊异。尴尬也好，惊异也罢，新派既立，门户已开，总得编织一个经纬纲维。尽管来得太晚，1993 年米勒在《南大西洋评论》(South Atlantic Review) 上发表《德里达的地形学》，还是“追认了”解构批评的合法性，试探了解构批评的可能路径，阐发了解构批评的基本原则。

德里达的“地形学”，而且是复数的“地形学”。米勒论文的标题就呈现了一种迷惑：看来德里达与德勒兹一般无二，一个浪荡者，一个游牧人，都在自己的文本体系之中立体地描绘千块高原，其中根茎交织，沟壑纵横，洞穴密布，凶险难卜。德里达早就谆谆告诫，言之凿凿：“关于要去探险之所，我有足够的认识，且充满恐惧地认为，那里事事不平；若是周详考虑，最好还是不要贸然前往。”凶险无所不在，一旦迈向解构之途，就会遭遇迎头棒喝：解构是“非历史主义”“虚无主义”，不讲道德以及不负责任，而且解构批评根本就不是批评而是以批评为由头展示那些怪异的哲学，而这些怪异的哲学就是“达达主义的学术版”。从德里达出道江湖，到米勒撰写这篇论文的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责难已经是老生常谈，德里达及其同仁都忍受多年了。主流学术讲述历史的方式可谓得心应手，其惯用的方略乃是拉起意识形态的旗帜，呼吁回归到一种不加反思更是不加批判的文学阅读上，即再现式的、主题学的以及传记学的文学阅读，而解构论所开拓的修辞学阅读被视为不由正道，礼拜虚无，废黜责任，不讲道德。对此，米勒的辩护略见几分无奈，无奈中却有几分雅量与厚道：归向传统阅读方式的不幸后果在于，一旦视之为理所当然的圭臬，那就挫败了当今文化研究、女性研究、族裔研究以及“少数话语”研究之中奋力展开的政治与思想志业，而这种志业不仅必不可少，而且至关重要。

怀着这么一泓悲愿，米勒进入了德里达“地形学”的隐秘空间，以一种全景绘图的程序，描绘这个巨大的未知领域：从词语开始，经过灰烬、犁沟、岩石、洞穴而下沉到黑暗的墓穴，追问文学与“隐秘的无场之所”（secret place without place）之间的关系。通过发掘德里达与现象学的关联，米勒梳理出一条从解构通往“文学对象之理念性”的隐秘途径。按照德里达的说法，文学是一套奇特的体制，文学对象之理念性在于“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言说一切可能的对象”。乍看起来，好像文学不负责任，然而现代民主体制保障了自由的绝对权利，同样也保障了“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言说一切可能对象”的绝对权利。文学的“不负责任”恰恰是最紧迫责任的基础。因为，“对现存结构化的意识形态权力不负责任，乃是开始担负一种无限紧迫责任